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王妙純**

【提要】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園林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時期，此時「皇家」、「寺觀」、「私家」三大類型園林並駕齊驅。由於魏晉時期是士族形成、發展及其到達頂點後又趨於衰落的階段，魏晉士人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必然會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有所表現，此期興起的士族莊園正是其在居住方面的具體表現。莊園使得士族不僅有豐厚的經濟基礎，同時憑其豐富的人文素養與獨特的審美眼光，於是紛紛在自己的莊園內打造了私家園林，而成為後代文人園林之濫觴。自此以後，私家園林與皇家園林分庭抗禮，成為中國園林的一朵奇葩。與此同時，佛教的傳入與道教之流傳，寺觀園林也開始湧現，中國園林三大系統於焉形成。透過《世說新語》一書，即可看出此期皇家、寺觀、私家園林鼎足而三的盛況。到底魏晉園林文化有何傳承與變異之處？魏晉士人園林審美趣味究竟為何？士人又如何透過園林而展現其內心世界與精神風貌呢？這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關鍵詞：《世說新語》 魏晉士族 園林文化 皇家園林 私家園林 寺觀園林

* 本文蒙匿名審查學者之悉心指正，惠賜許多寶貴意見，獲益良多，無任感荷。

** 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組副教授。

一、前言

魏晉以前，中國園林以皇家園林為主體，然而隨著士族莊園經濟的發展，私家園林勃然興起，逐步成為中國園林中的一枝奇葩。與此同時，佛教的傳入與道教之流傳，寺觀園林也開始湧現，中國園林三大系統於焉形成。此時，園林布局趨向小巧精緻，並凸顯人為與自然的親和無間。園林經過了精心巧妙的安排之後，展現了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審美趣味。中國園林藝術從「本於自然」邁向「有若自然」的境地，此期之園林藝術也體現了「重神輕形」的總體審美思潮。

藝術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它反映了當代經濟現象、文化習尚、學術思想、審美風潮、宗教信仰……等，映照出一個社會的時代精神。據此，我們若以「園林」為鏡，不僅可以窺看魏晉時期人物的內心世界，也可以此觀察中國文化到魏晉時代所呈現出的新特點。魏晉南北朝雖已走遠，然而《世說新語》中的「園林」事例，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當代社會與文化極佳的切入點，同時也可窺視魏晉士人的內心世界與精神面貌。本論文即以《世說新語》為文本，依序探討「皇家」、「寺觀」、「私家」三大類型之園林文化及其士人臥游其中之精神風貌。

二、皇家園林文化

我國園林起源於商朝末年的「囿」，其特點是範圍很大，基本上純任自然，放養野獸，並有園圃耕作，除供帝王畋獵遊樂之外，也有經濟生產。據《詩經》毛注，天子的囿方圓百里，諸侯的囿方圓四十里。「秦和西漢開始了『苑』的盛行，仍專屬於帝王。它動輒包攬二三百里的大尺度，以及真山真水，都與囿相同，所以又常合稱為苑囿。但苑的內容更豐富，人工經營也更多。如苑內有一些規模往往甚為巨大的離宮別館等建築組群，大苑中復有許多小苑。秦之上林苑和西漢之上林苑都是著名的苑。西漢梁孝王在河南商邱的兔園也是苑，規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69 ·

模雖較小，也是『諸宮觀相連，延亙數十里』。」所以在東漢之前，不論是「囿」與「苑」，其佔地都是相當廣大的。

三國時期，魏、蜀、吳都在各自的首都進行宮苑的設置。北方為鄴城和洛陽，南方為建康，都有重要的皇家園林。鄴城的御苑「銅雀園」毗鄰宮城之西，在靠西北城牆處築高三臺：冰井臺、銅雀臺（亦作銅爵臺）、金鳳臺分別儲存冰、鹽、糧食。三臺係為漢末曹操為治府第所作，據《鄴中記》載：「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因城為基址。建安十五年，銅爵臺成，曹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為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銅爵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彌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

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左思〈魏都賦〉也言：「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亂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霽，下冰室而沍冥。」可見三臺之寬廣與高聳。銅雀台位於「今河北省臨漳縣附近內。但滄海桑田，如今鄴城大部分在漳河底下了，只有銅雀台一帶，還位於漳河岸上，可見到基址。」《世說新語》原文與劉孝標注中提及「銅雀臺」一詞者共有三處：

（曹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文學篇〉第66條注引《魏志》曰，頁244）

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言語篇〉第86條注引魏武〈遺令〉曰，頁142）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蕭默：《中國建築史》（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1刷），頁133~134。

晉·陸翹：《鄴中記》，收於《龍溪精舍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七函，頁2。

左思〈魏都賦〉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2年11月初版）卷6，頁100。

沈福煦：《中國古代建築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頁83。

本論文所引《世說新語》之內文，乃根據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仁愛書局，1984年10月）為主。而為行文之方便，有時逕以「《世說》」稱「《世說新語》」。以下所引之《世說新語》均依據此版本，不再加註，僅標註頁碼。此事亦見於《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5月）卷19〈陳思王植傳〉，頁557，可互資參照。

· 東海中文學報 ·

· 70 ·

（〈言語篇〉第86條，頁142）

曹植援筆立就，文采煥發，想必當時在銅雀臺的他，胸有成竹，逸興遄飛，由其傳世之〈銅雀台賦〉一文，猶可想見其倚馬可待之才情；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三也保留了魏武帝〈遺令〉曰：「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于臺堂上安六尺牀，施總帳，朝哺上脯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不命祭。諸舍中無所為，可學作組履賣也。」曹操對婢妾之安置，可謂煞費苦心，甚至連婢女的消閑活動，也早已預作安排——「學作組履」。一代梟雄，對男女之情，似有無限之眷戀。銅雀臺上的點滴回憶，也可能是曹操生命中最美的一頁，故臨終之時仍心心念念，不可或忘；王獻之批評羊祜不如銅雀台妓，按羊祜一生，功在社稷，西晉因其才德，方能奠定征服東吳基業。然如此功業彪炳之人，卻是「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飄」之人。若依道德情操而言，羊祜自是清德佳士，然而王獻之偏不從道德角度去欣賞人，他率性而發，離經叛道。曹氏父子之言行展演著銅雀臺

上的風流韻事；王獻之「不如銅雀臺上妓」之語，凸顯了當時「越禮教任自然」的審美風尚。

高臺之園林建築在曹魏時代一度流行，位於洛陽城內的西游園中也有陵雲臺：

陵雲台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世說新語·巧藝篇》第2條，頁715）

此臺相傳為魏文帝於黃初二年所建，「陵」通「凌」。《洛陽伽藍記·卷1·瑤光寺》載：「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

曹植《銅雀台賦》見於《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9月4版）卷19〈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陰澹《魏紀》曰：「從明後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頁558。

魏武帝〈遺令〉見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三，該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6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58。

「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飄」語出《晉書·卷34·羊祜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月5版），頁1033。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71 ·

從此則故事，可體現中國建築的進步，該樓臺的設計者、施工者顯然精於力學又深諳木頭質性，故能建造「隨風搖動」之臺，然而魏明帝卻是外行充當內行，以大木扶持，以致樓臺重心失衡倒塌，實令人浩嘆。本條注引《洛陽宮殿簿》載：「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頁715）「若以漢代一尺約等0.23米計算，該臺已高達20多米之高，作為木構（井幹式結構）的臺，且底小上大，這個高度已不算低了。」直至西晉，陵雲臺仍是御用之臺。同書〈規箴篇〉第7條也記：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台上坐，衛瓘在側，欲微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頁555）

太子即是痴呆蒙愚的晉惠帝，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竟言「何不食肉糜？」後竟釀成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國土淪喪。衛瓘藉遊園而行勸誡，撫帝座醉云「此坐可惜」，乃以隱喻方式喻示武帝，言簡意賅，可謂深得風人之致。

此外，三國孫吳宣明太子孫登在建康太初宮西門外創建西苑，並鑿西池。

晉元帝即位，明帝為太子，復加以整建，多養武士於池內築土為臺，時人呼為「太子西池」，《世說新語·豪爽篇》第5條記：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頁599）

晉明帝果敢剛烈、雷厲風行之性如在目前。本條注引《丹陽記》曰：「西池，

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頁599）程炎震也云：「《初學記》十引徐爰釋問注曰：『西苑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有土山臺，晉帝在儲宮所築，故呼為太子池。或曰西池。』《文選》二十二謝混〈遊西池〉注曰：『西池，丹陽西池。』」可見在魏晉時期，疊山聚石、引水穿池之園

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1刷）卷1〈瑤光寺〉，頁46。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8月），頁77。

建康為吳國丹陽郡的治所，在今江蘇省江寧縣東南五里。《讀史方輿記要》卷20南直二「華林園」條曰：「又有西池，吳宣明太子孫登所鑿也，亦謂之太子西池，在宮西隅，因名。晉南渡後，往往游宴於此。」該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60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89。

余嘉錫箋注引，頁599。

· 東海中文學報 ·

· 72 ·

林技術已臻成熟，皇家園林構築藝術之精巧可略知一二。

魏晉南北朝最為著名的皇家園林，當屬華林園，《世說新語·言語篇》

第61條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頁120~121）

簡文眼中的山水，不再是神祕、冷漠、遙遠、純物質的存在，它彷彿可以與人交融會心，沒有任何距離，物我相契，兩忘俱一。據《晉書》記載，簡文帝是元帝之少子，從小穎慧，為郭璞稱譽賞。成年後，「清心寡欲，尤善玄言。」他在華林園所說的這段話，極富有移情於物的哲理趣味。「濠、濮間想」是我國古代美學史上極具盛名的兩件事，俱見《莊子·秋水篇》，一則乃記莊子在濠水邊和惠子辯論魚樂，另一則記莊子在濮水邊對楚王的使者言道寧可曳尾泥中也不願做神龜被供奉。前者說自然可親，後者說生命與自由的可貴，此正是歷代有文化素養的帝王之所以寄情園林之因。歷代的皇家園林，大都設有「會心不遠」、「山水自親」之景點，以涵泳性情或觀物達理。《世說新語》又記：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雅量篇〉第40條，頁378）

古人認為長星（彗星之屬）出現為不祥之兆，孝武帝在白天之時看到長星心裡非常厭惡，然在夜晚時，卻能豁達地與之對飲。宗白華即認為「晉人有深沈東晉華林園本是三國孫吳之宮苑，《景定建康志》卷22〈城闕志·園苑〉載：「古華林園，在臺城內，本吳舊宮苑也。」該書收於王曉波等點校：《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1版1刷），頁1060。

《晉書·卷9·簡文帝紀》（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月5版），頁219。

《莊子·秋水篇》記：「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同篇又記：「莊周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以巾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見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初版12刷），頁484~487。

古人認爲長星出現爲不祥之兆，可參見以下二書之註解：一、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8月1刷），頁347。二、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全評新註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3月1刷），頁438。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73 ·

而清醒的宇宙意識，他們將人生和命運放在無窮宇宙的大座標系上思考，故能超越有限人世的形累，擺脫禮教世俗的枷鎖，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無名的哀愁。」蔣凡等學者也說：「簡文之濠濮間想，孝武之舉杯囑星，均表徵了晉人之灑脫、輕盈，而又交織著深沈的宇宙觀、生命觀。」而引發簡文、孝武二帝深沈的宇宙觀、生命觀的處所，正是在華林園。

三、寺觀園林文化

皇家園林自古有之，私家園林在漢代也出現了，唯有寺觀園林是在魏晉南北朝獨特的時空中才鼎盛起來。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序言道：「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緹繡，土被朱紫而已哉。」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寺觀園林繁榮興盛之狀。

魏晉南北朝之寺廟多如雨後春筍，唐代杜牧〈江南春絕句〉詩曾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詩中所言寺廟的數字，曾引起許多後人的關注。清末陳作霖編撰《南朝佛寺志》收錄六朝有名可考的寺廟高達226座。今人盧海鳴在其所著《六朝都城》一書中，即認爲南朝建康一地的寺廟應介於500到700之間。此與杜牧所言480之數相去不遠。《世說新語》一書也記載了一些寺廟，諸如瓦官寺、白馬寺、東安寺、會稽西寺等，茲表列如下：

寺廟名稱 見於《世說新語》處 事例大意

瓦官寺 〈文學篇〉第30條 北方僧人與支遁遇「瓦官寺」

瓦官寺 〈文學篇〉第57條 僧意與王脩在「瓦官寺」辯聖人有情否

瓦官寺 〈識鑒篇〉第17條 戴逵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

瓦官寺 〈排調篇〉第22條 何充往「瓦官寺」禮拜甚勤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臺北：洪範書局，1984年2月3版），頁67。

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全評新註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3月1刷），頁439。

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頁1。

· 東海中文學報 ·

· 74 ·

白馬寺 〈文學篇〉第32條 支遁在「白馬寺」講《莊子·逍遙篇》

東安寺〈文學篇〉第42條 支遁住「東安寺」與王濛講論名理

會稽西寺〈文學篇〉第38條 支遁在「會稽西寺」講論名理

寺〈言語篇〉第41條 庾亮入「佛圖」

寺〈言語篇〉第51條 顧和至「寺」見泥洹像，以此測內外孫資質高下

由此表得知，寺廟不僅可以用來聚徒講學，同時也是僧俗二眾交誼之處，更是研討義理之所在，當時多少的玄學命題之論辯就在寺廟中如火如荼地展開。而寺廟的興盛必然也會導致寺廟園林的興盛。受私家園林影響，此時的寺觀亦趨園林化，《世說新語·棲逸篇》第11條記：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頁660）

康僧淵之精舍講堂，依山傍水，遠離塵囂，環境幽雅，美不勝收。他在這裡不僅講學會友，同時也吐納養生，玄佛雙修。當時的政要人物——庾亮料理國事之餘，還要出城與之研討義理。名僧康僧淵炙手可熱之狀活現眼前！

東晉佛教高僧慧遠，於晉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在刺史桓伊的幫助之下，於廬山營造東林禪寺，該寺即是典型的園林寺觀，其環境之清麗幽雅，絲毫不遜於私家園林，《高僧傳·卷6·慧遠傳》記：

刺史桓伊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創立精舍，洞壺山美，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

慧遠儼然是一位出色的治園家，他利用無中生有、虛實相生之理，一手打造了佛教的淨土。他在廬山一住三十年，聚徒講學，成為當時南方佛教的宗師。直至晚年，仍講授不倦：

「佛圖」同「浮圖」，即寺也。

梁·慧皎：《高僧傳》（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6年1月2版），頁311。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75 ·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詠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世說新語·規箴篇》第24條，頁572）

高僧慧遠以夕暉自況，並以朝陽期許怠惰之弟子。蒼涼的語意中，充滿了長者對晚輩的慈愛與包容。慧遠示現了佛對眾生的慈悲與平等。而「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的描寫，更將一代高僧之行誼刻劃得栩栩如生，使人遙想其遺容而「肅然增敬」。此條事例展現了慧遠弘揚佛學和專心教育的巨大熱情。魏晉時代的官學教育，因時代動亂之故，屢遭破壞。慧遠講學東林，乃是應運而起，而此舉也適時地彌補了部分文化的斷層。當時慧遠還組織了「白蓮社」，參加者不僅有教徒，更有玄學家、儒者等共一百多人，其中儒者雷次宗、畫家

宗炳等人都是著名的人物。

魏晉南北朝盛行「捨宅立寺」的風氣，貴族多將自己的宅園奉獻給寺院，以做為功德。如許詢曾於永興、山陰建園宅，後來捨此二處園宅為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東晉鎮西將軍謝尚亦捨宅為莊嚴寺。刺史陶範，因仰慕廬山慧永大師清高之道風，捨宅建西林寺。司徒王珣及其弟王珉原本在虎丘山建造東西二宅以為別墅，後亦捨宅為寺，總名曰虎丘山寺，又分稱虎丘東寺、虎丘西寺。《高僧傳·卷13·釋慧受傳》也記：「晉興寧中來游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坦之即舍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斗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並舍以成寺。」這種「捨宅立寺」的風氣反映了當時佛教之興盛與士僧二者往來之密切之情況。

魏晉南北朝的寺觀園林具有非常濃厚的文化色彩，彷彿是當代的文化沙龍、學術重鎮。張承宗先生以為魏晉時期「清談名士與名德高僧在一起談玄說法，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推動了哲學思想、文學、藝術、音樂、繪畫、雕塑等各個門類的發展。」在亂世之中，寺觀園林恰似佛國淨土裡，靜靜地開出的一朵文化之花，令人驚艷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兩則或可提供寺觀園林之中僧人有豢養動物之逸興，

《世說新語·言語篇》第69條余嘉錫注引《建康實錄》八，頁128。

梁·慧皎：《高僧傳·卷13·釋慧受傳》，頁705~706。

參見張承宗：《六朝民俗》〈第三章·居處及園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9月），頁111。

· 東海中文學報 ·

· 76 ·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第63條，頁122）

支公好鶴，住剡東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緘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第76條，頁136）

《高逸沙門傳》說支遁「沈思道行，泠然獨暢。」（〈言語篇〉第63條注引，頁122）故其思考常能突破世俗的名利框架，他不把馬當成供人乘坐驅遣的「俗物」，反而把牠當成是俊逸奔放的「英物」，一俗一雅間，更顯其高蹈人間、超然物外之趣。支遁講經也別創一格，往往直指文義而遺漏章句，於是為俗人所譏，然謝安卻是譽為「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俊逸。」

其講經風格與賞馬如出一轍，俱是展演「重神輕形」、「得意忘言」的當代美學觀；支道林願意犧牲一己之嗜好，而全鶴之性，支公果真「好鶴」。此種推己及「物」的關懷、體諒與尊重，與皇家苑囿之對待動物大相逕庭，《晉書》即載：「濟（楊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

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支遁慈悲為懷，示現並實踐眾生平等之佛門高義，實與皇家動物之待遇南轅北轍！

四、私家園林文化

私家園林，乃伴隨莊園而來。莊園，也叫莊田、莊宅、莊居，或者稱別墅、別業、別莊。莊園的形成源遠流長，西漢之間已露萌芽，到六朝漸盛。莊園的結構分三部分：一是莊園的房屋：此即莊主之住所或者別墅；二是田園：除了耕種的田地外，還包括有果園、菜園、水碓、店鋪、茶園以及山澤森林等等；梁·慧皎：《高僧傳·卷4·支遁傳》云：「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頁237。

《晉書·卷40·楊濟傳》，頁1181。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77 ·

三是莊戶的住宅：亦稱客坊，除客莊之外，小商人及自耕農也有居住其間者。中國土地私有制的特色之一，即是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種現象，到漢代已非常明顯，漢武帝時衡山王「數侵奪人田，壞人冢為田」；漢高祖幸相蕭何即利用特權購置「田宅數千萬」；漢武帝丞相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東漢梁冀「多拓林苑，禁同王家……周旋封域，殆將千里」；竇憲「以賤值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皇戚權貴如此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而一般官僚、地主與富商更是熱衷此道。時至三國魏晉，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葛洪《抱朴子》說東吳大族「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晉書·卷69·刁協附刁達傳》載：「(刁達)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

時至兩漢，中國知識分子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士人不再是無根的游士，士的背後往往附隨著整個宗族，士人與宗族之結合即是「士族」。士族取得政治權力後，即制訂了一系列對自己有利的制度，以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於是士族積極搶佔土地，建立田園，修造別墅，蔭附人口，擁有非常雄厚的經濟實力。而莊園經濟的獨立，是士族人格獨立的基礎。王曉毅先生即說：

（西漢）官僚階層在經濟上依靠國家俸祿和來源於國家權力的其他超經濟剝削（貪污受賄等），在政治上與上下級形成人身依附和被依附關係，最終隸屬於皇權。他們沒有獨立的經濟政治地位，是國家機器上一些沒有個性的大小零件和螺絲釘，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心理意識。……漢晉之際，在傳統的封建經濟形態中，迅速發展著一種新的生產組織形式——莊園。……這種獨立性很強的莊園，是士族人格獨立的基礎。

丁俊清：《中國居住文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1版2刷），頁68-69。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118·淮南衡山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1月9版），頁3095。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53·蕭相國世家》，頁2018。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107·魏其武安侯（田蚡）列傳》，頁2844。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34·梁統附玄孫梁翼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月5版），頁1182。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23·竇融附竇憲傳》，頁812。

晉·葛洪撰；陳飛龍註譯：《抱朴子外篇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2年1月初版1刷）〈吳失篇〉第34，頁486。

《晉書·卷69·刁協附刁逵傳》，頁1945~1846。

有關士族的形成，可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1刷）「五、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三）士族的形成探源」一文，頁220~225。

王曉毅：《放達不羈的士族》（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7月臺灣初版），頁8~9。

· 東海中文學報 ·

· 78 ·

經濟物質的獨立，間接地也催化了士人人格精神的獨立。人格精神獨立之後，士人可以跳脫三立（立德、立言、立功）的儒家人生觀，暫時拋卻國家民族之大包袱，大膽赤裸地呈現理想的居住模式。大東漢仲長統〈樂志論〉即明確地提出士族莊園的雛型：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丁俊清先生說：「〈樂志論〉這裡有避世和養生之思想。表面看來似乎是悲觀、厭世的表現，實質上深藏著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追求，是士人的心思、眼界、興趣由物質轉向內心、由社會轉向自然、由客觀外物轉向主體存在的表現。」仲長統所敘，可以視為漢晉之際士人對居住環境的典型追求。

魏晉之際的政治鬥爭十分激烈，許多士人以縱情山水來逃避政治禍害。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世說新語·簡傲篇》第3條注引〈文士傳〉，頁767~768）向秀又與嵇康、呂安友善。「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常業。」可見呂安亦有園田之屬。嵇康等三人造事營生，放跡山野，頗能快意生活，自得其樂。

西晉時，士族莊園開始較為普遍，其中以王戎、王濟、王愷、潘岳、石崇

〈樂志論〉收於《後漢書·卷49·仲長統傳》，頁1644。

丁俊清：《中國居住文化》，頁70。

《世說新語·簡傲篇》第3條余嘉錫箋注引《御覽》490引《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趨舍進止，無不必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

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游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常業。」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69。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79 ·

等人為代表。《世說新語·儉嗇篇》第3條記：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頁873）

王戎生財有道，聚斂有方，不僅其他諸賢難以匹敵，即便洛陽富豪也難望其項背。王隱《晉書》也說他「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同前條注引，頁874）可見王戎之園田財富恐是洛陽之最。由此例可得知，王戎的莊園位於繁華的洛陽，內有住宅、肥田、水碓之類，並擁有僕役無數。此外，潘岳的莊園亦相當可觀，其〈閑居賦〉記：「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其辭又曰：「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灑灑，菡萏敷披。竹木翦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棗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芡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潘岳莊園內有農、漁、牧業等經濟產物，其果樹、蔬菜種類之多，也是令人嘖嘖稱奇，而且都是各地珍奇上選之品種，堪稱是自給自足的莊園。潘岳得空之暇，可垂釣池塘，賞花看魚，悠游歲月，實為愜意！

西晉的莊園以石崇金谷園最為出名。史載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石崇晚年辭官後，居洛陽城西北郊金谷澗畔的金谷園，其〈金谷詩敘〉曰：

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世說新語·品藻篇》第57條注引，頁530）

同事亦見《晉書·卷43·王戎傳》曰：「(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頁1231，可互資參考。

〈閑居賦〉見《晉書·卷55·潘岳傳》，頁1505。

同前註，頁1505~1506。

《晉書·卷33·石崇傳》，頁1007。

· 東海中文學報 ·

· 80 ·

又據石崇所作〈思歸引序〉云：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

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

由此可見，石崇經營金谷園的目的，是爲了退休之後安享山林、吟詠游樂與服食養生之用，因此這座園林在設計上，便帶有濃厚的休閒適意的氣息。該園依山傍水隨勢而築，園內建有大量的景觀，有主人居住的房屋「樓閣」與用於觀賞風景的「觀」，還有從事生產的水碓、魚池、土窟等建築。金谷澗水穿錯縈繞於建築物之間，沿岸可垂釣，河道可行船。當時的名流常在此歡會宴飲，《世說新語·品藻篇》第57條注引〈金谷詩敘〉載：「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箬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頁530~531）當時蘇紹、潘岳、杜育等人都是坐上嘉賓，均有詩作傳世。潘岳即歌詠金谷園之景物曰：「回溪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稗。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還坐登隆坻。」金谷園內樹木繁茂，顯然經過精心綠化設計，前庭有沙棠，後園有烏稗。園中風景賞心悅目、令人心馳神往。金谷園似乎是一座園林化的莊園，其精緻之處與兩漢私家園林的粗放，大相逕庭。金谷園的遺址，依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大約在今洛陽市東北十公里，孟津縣境內的馬村、左坡、劉坡一帶，正好位於魏晉洛陽故城的西北面。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2年11月初版）卷45 序上〈思歸引序〉，頁642。

晉·潘岳；董志廣校注：《潘岳集校注》〈金谷集作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23。

金谷園的遺址，據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有一段文字記載：「谷水過河南王城西北，東至千金塢，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渠也。谷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南流曆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晉尉卿石崇之故居。金谷水又東南流入于谷，谷水又東經金墉城北。」所謂「石崇之故居」即金谷園，按文中的描述，大約在今洛陽市東北10公里，孟津縣境內的馬村、左坡、劉坡一帶，正好位於魏晉洛陽故城的西北面，這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81 ·

東晉時期，士族莊園更有長足的發展。號稱「江左管夷吾」的宰相王導，也有莊園、別墅：

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世說新語·輕詆篇》第6條注引《妒記》，頁829）

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郭文）。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文）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

《妒記》又載王導密營別館、金屋藏嬌之事終被曹氏知悉，於是夫人持刀追討，王導飛轡出門，以塵尾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頁829）。看來習染玄學清靜無為的宰相，也難忘情聲色；王導對隱士禮遇非常，特將郭文置於莊園之西園，顯然這裡的環境相當優渥自足，故郭文能在此園七年足不出戶。由此二條可見王導的莊園乃用來藏嬌和禮賢之用。

東晉另一位風流宰相謝安也有莊園。他本有隱居之志，後因朝廷屢次下令徵召，勢非得已，四十歲時才入朝為官。謝安之所以能甘於寂寞，隱居長達二十餘年，即是因為他在會稽東山有一個令他不忍離去的莊園：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世說新語·識鑒篇》第21條，頁403）

謝安畜養歌妓，令之在宴會中載歌載舞，歡愉嘉賓，與眾同樂，簡文由此即斷言他將來必出仕做官，簡文可謂見微知著。而《晉書·卷79·謝安傳》也載他「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一帶地方發掘的唐墓中有「葬于金谷村」的墓誌，足證唐代仍沿用金谷之名，而且還是一處風景遊覽地，多有當時文人的題詠。如杜牧〈詠金谷園〉詩云：「淒涼遺跡洛川東，浮世榮枯萬古同；桃李香消金谷在，綺羅橫斷玉樓空。」寫的就是石崇的愛姬綠珠墜樓的故事。這裏北枕邙山，丘谷略有起伏的地貌與〈思歸行〉序文中所描寫的亦相吻合，只是金谷澗現已湮沒無存了。現在洛陽火車站附近的金谷園遺址乃是宋人的誤會，以訛傳訛而至於今。可參考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3月），頁52-53。

「江左管夷吾」句見《世說新語·言語篇》第36條，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97。

《晉書·卷94·隱逸傳·郭文傳》，頁2440。

見《世說新語·排調篇》第26條注引《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801。

· 東海中文學報 ·

· 82 ·

屬文，無處世意。」這種高臥東山莊園的生活，自是愜意非常。長達二十年的隱居，造就了謝安無上的聲望，然後來他卻變節出仕，這種前後矛盾的行為即引來高靈的譏諷：「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世說新語·排調篇》第26條，頁801）還有比高靈更不客氣的，同篇第32條記：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通乃不惡，亦極有會。」
（頁803）

「遠志」與「小草」同為一物而有根與葉之不同。葉名小草，根名遠志，根埋土中為「處」，葉生地上為「出」。郝隆之答，既協物情，又因以譏謝公，語意雙關，故為妙對也。《世說新語》記載謝安面對高靈與郝隆之嘲諷反應不

盡相同。面對高靈，則「笑而不答」，面對郝隆，則「甚有愧色」。或許「笑而不答」更得謝安心理底蘊，他素來最愛《詩經》中的「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之句，以為是雅人深致。這種表達朝廷重臣情懷之詩句竟是他認可的極品之句，這就透露著他的內心消息——自始至終，他心懷魏闕。然而他卻又是這麼熱愛莊園生活。後來謝安雖然位極人臣，依然解不開他的莊園情結。《晉書·卷79·謝安傳》載淝水之戰前夕，「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謝玄）園棋賭別墅。……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大敵當前，謝安竟是在別墅園棋聚賭，這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然而這場敵我力量非常懸殊之戰，也勢必要有非常之人，才能穩定軍心，以寡敵眾。在這東晉存亡重要一戰，謝安仍不失名士曠達風度，神色自若，指揮若定。在此莊園具有調節功能，它調節了士人緊張的心情，使他們在魏闕與山林之間張弛有度，應付裕如。謝

《晉書·卷79·謝安傳》，頁2072。

見余嘉錫箋註：《世說新語箋疏》，頁804。

《世說新語·文學篇》第52條記：「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曇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見余嘉錫箋註：《世說新語箋疏》，頁235。

《晉書·卷79·謝安傳》，頁2075。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83 ·

安淝水之戰的表現，正是長期浸淫玄學的結果，而孕育這種超然鎮靜、臨危不亂的精神搖籃正是莊園，莊園蓄積了他們的精神、心理能量，提供了士人取之不竭的精神養料與抗壓的源頭活水。《晉書·卷79·謝安傳》又載謝安自弟弟謝萬去世之後，「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不管是隱居或是出仕，謝安的生活裡，已離不開他的莊園別墅。

隸屬會稽郡的「東山」，在魏晉時代已成為隱居和方外人士的避世勝地，隱居重鎮。《世說新語》載戴逵「厲操東山」（〈棲逸篇〉第12條，頁660）、阮裕「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棲逸篇〉第6條，頁654）、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言語篇〉第93條，頁146）在東晉人看來，莊園隱居的生活是他們最理想的生存狀態。莫怪乎連方外之士支遁也想「買山而隱」（〈排調篇〉第28條，頁802），看來他最後也真的買成了，所以常隱「東山，不遊人事」，「東山」這個名詞，在魏晉時代已然成為隱士文化的象徵符碼。

會稽郡因「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而成為士族建立莊園的首選之地。

與謝安一樣在會稽擁有莊園的尚有王羲之、孫綽、許詢等人，《晉書·卷80·王羲之傳》載：「（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莊園中的好山好水自有玄家勝境，孫綽莊園雖只有

五畝之宅，卻頗能自得其樂。其〈遂初賦敘〉曰：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世說新語·言語篇》第84條注引，頁140）

〈遂初賦〉膾炙人口，名動當時，流布甚廣。《世說新語·言語篇》第84條記：「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頁140）《老子》同前註，頁2076。

《世說新語·言語篇》第63條，見余嘉錫注引《建康實錄》，頁123。

「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語出顧愷之所言，見《世說新語·言語篇》第88條：「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頁143。

《晉書·卷80·王羲之傳》，頁2098-2099。

· 東海中文學報 ·

· 84 ·

44章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同書46章亦曰：「過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可見當初孫綽建五畝之宅，確有知止知足、清心寡欲之想，然而孫綽本人卻是個熱衷「坐華幕擊鐘鼓」者，非淡泊名利之士，與〈遂初賦〉所言，正好背道而馳。其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故《世說新語·輕詆篇》第9條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頁833）吳地的辟疆園，是東晉時期江南最有名的私家園林，《世說新語·簡傲篇》第17條記：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之，傖耳！」（頁777）

本條注引《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頁777）余嘉錫箋註引《吳郡志》十四云：「晉辟疆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盛，號吳中第一。」（頁777）顧辟疆是仕宦之族，其莊園規模為吳中之冠。王獻之自恃門第，素來傲慢無禮，私闖名園，理當有虧。而名園主人也非等閑之輩，指責王獻之「非禮」、「非道」，顧氏得理不饒人，甚有個性。王獻之之兄王徽之也曾造訪私園，然卻有不同的遭遇：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世說新語·簡傲篇》第16條，頁767）

王徽之愛竹成癖，已到不可一日無此君之地步。擁有好竹之主人料名滿天下的王徽之行經吳中，必當來訪，便灑掃以待。誰知王氏見竹不見人，視之無物，全不顧念愛竹護竹之主人，也不顧念同好者的欣羨之情。當主人怒其失禮而關閉園門時，王徽之卻因此愛賞主人，留坐盡歡。王乾開云：「風流亦多，猖狂孫綽事見《晉書·卷56·孫楚傳附孫綽傳》，頁1544~1547。

《世說新語·任誕篇》第46條：「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60。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85 ·

太甚。」所評甚是，東晉士大夫擁有好竹好園之事例更添一樁。另外也有士族自擁「田宅」者，《世說新語·品藻篇》第56條記：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頁530）

江彪為晉中興大臣，累官至尚書左僕射，然卻被譏為「田舍」，意即「鄉下人」、「鄉巴佬」。六朝貴族常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江彪卻以士族身分親自耕種宅田，實難能可貴。由此例也證明江彪確有土地。此條置之於〈品藻篇〉，足見「田舍」見賞之狀。王敦亦有「田舍」之名，但眾人聽過他「打鼓吹」之後，舉坐均「嘆其雄爽」。可見只要有才氣、有能力，即便是「田舍」，依舊能入魏晉風流之列，正是「楂、梨、橘、柚，各有其美。」（《世說新語·品藻篇》第87條，頁546）可證《世說新語》品人視角的多元豐富。

謝靈運位於會稽的始寧莊園別墅，則將莊園園林藝術帶入另一番新的境界。他努力將仲長統〈樂志論〉中的理想居住狀態落實於現實生活之中，企圖將莊園打造成為「幽人」的「息止之鄉」，他在〈山居賦〉中言及他的莊園構造：

翦榛開徑，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朴，果甘露於道場。

經台、講堂、禪室、僧房等都是東晉之前的莊園記載中較少出現的建築，謝靈運「將之置於刻意選擇的山川之中，與其優雅恬靜、逍遙自適的生活融合成一體，顯得十分和諧。所謂的『幽人息止之鄉』，由此即可得知一二。」謝靈運

劉強輯校：《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頁441。

《世說新語·豪爽篇》第1條：「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595。

《宋書·卷67·謝靈運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5月5版）頁1754載：「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下文所引〈山居賦〉均據此版本。

馬良懷：〈漢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生存狀態之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14。

· 東海中文學報 ·

· 86 ·

運在其自注〈山居賦〉中曾經言道：應瑒、石崇等人的莊園不得「周圓之美」，認為是「千乘宴嬉之所，非幽人息止之鄉。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這種審美觀，實已和先前士人營造莊園的理念大不同。他更注重於山水與建物的形貌互契，相輔相成，進而達到融合無間、相互輝映之效。此正是計成《園治·山林地》所言：「園地惟山林最勝，……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功。」此外，謝靈運還相當重視「借景」的藝術技巧，他深諳敞戶闢窗，由內借外之妙，〈山居賦〉又曰：

敞南戶以對遠嶺，辟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口幾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

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峰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赭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飛埃之未牽。

透過門窗之設，即可破除內外之障礙，盡覽山水田園風光。計成言：「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又曰：「園林巧於因借，精在體宜……園雖別內外，得景則無拘遠近。」可見因地制宜、巧於因借正是造園成功的主要關鍵。此外，謝靈運亦深知「相地立基」之理，〈山居賦〉道：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

謝靈運不假龜筮，躬親探勘，經山涉水，由朝至夕，風雨無阻。此正是計成所謂「故凡造作，必先相地立基。」謝氏在設計、安排、構置莊園的內部景觀和結構，充分體現了文化涵養與審美觀念，他將莊園主人、士族、高品味文化人三者身分融合為一體，有意識地型塑兼具物質與精神的莊園，加速了莊園審美化的進程，開拓了士族文人的審美視域，將莊園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山居賦〉中的莊園標誌著六朝士人造園造景藝術的新尺度、新境界。郭張家驥：《園治全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1刷），頁179。《園治》是中國造園學家計成所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論述造園的傑作，也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造園學名著。

以上二段文字分見《園治·借景》與《園治·興造論》，分見張家驥：《園治全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1刷），頁326、162。

《園治·興造論》，見張家驥：《園治全釋》，頁162。

·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 87 ·

必恆學者即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家園林「主要特色是以假山摹寫自然的真山，而且不僅能真實地再現自然，更能集中體現自然之美，可以說是師法自然，而巧奪天工。體現了『小中見大』的規劃思想，破除了漢代私園大規模寫實性摹擬自然的方法，體現了由寫實向寫意與寫實相結合的過渡，是造園藝術在創作方法的一個飛躍。」又言：「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修建了體現個人生活情趣的私家園林，開創了文人園林的先河。」張承宗學者也說：

私家園林在六朝時期經歷了一場大的質變。園林規模從宏大變為小巧，內容組合從粗放轉為精緻，造園方法從單純寫實過渡到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由模擬山水轉變為對自然加以概括和抽象。這一時期的私家園林，不僅在量上迅

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在內容上產生了源於自然而又高於自然的飛躍，奠定了古代私家園林以描摹和再創自然山水為中心的建園思想，形成了自身的類型特徵。自此之後，私家園林與皇家園林分庭抗禮，成為中國古典園林的一枝奇葩。

魏晉南北朝的私家園林格局小巧精緻，神韻渾然天成，可以說是中國園林史上的一頁奇葩。「莊園」是魏晉南北朝文人精神的棲想地和避難所，是哺育士族靈魂的搖籃，也是文人創作的源泉、精神的故鄉與心靈的樂土。士人在莊園內提煉文思與玄意，在莊園內演繹放達與風流。

五、結論

本論文之研究宗旨在探述魏晉士人在園林空間所實踐的文化活動與精神趣味。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園林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時期，此時皇家、寺觀、私家園林三大類型並駕齊驅，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本文依序概要介紹其規模格局、代表施設以及出現在《世說新語》中之軼事，並進而闡論人物之行爲意義。

《世說》中所見的皇家園林與建築有鄴城的銅雀園、洛陽西游園的凌雲
鍾敬文主編；郭必恒等著：《中國民俗史》（漢魏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頁158。
同前註，141。

張承宗：《六朝民俗》〈第三章·居處及園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9月），頁109~110。

· 東海中文學報 ·

· 88 ·

臺、建康西苑的西池與華林園。高臺之園林建築在曹魏時代一度流行，位於洛陽城內的西游園的陵雲臺即是此期之代表，該臺已高達20多米之高，堪稱宏偉。魏晉的皇家園林，大都設有「會心不遠」、「山水自親」之景點，以涵泳性情或觀物達理，此亦反映了以玄對山水的時風。

寺觀園林有康僧淵在豫章的精舍講堂與慧遠在廬山所建的東林禪寺。受私家園林影響，此時的寺觀亦趨園林化，《世說》載康僧淵之精舍講堂，依山傍水，遠離塵囂，環境幽雅，美不勝收。他在這裡不僅講學會友，同時也吐納養生，玄佛雙修。魏晉時期的寺觀園林具有非常濃厚的文化色彩，彷彿是當代的文化沙龍、學術重鎮，清談名士與名德高僧在一起談玄說法，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推動了哲學思想、文學、藝術、音樂、繪畫、雕塑等各個門類的發展。

私家園林的代表有王戎、王濟、王愷、潘岳、石崇……等人。其中西晉石崇的金谷園頗富盛名，而吳地的辟疆園，是東晉時期江南最有名的私家園林。此外，宋朝謝靈運位於會稽的始寧莊園別墅，則將莊園園林藝術帶入另一番新境界，謝氏將莊園主人、士族、高品味文化人三者身分融合為一體，有意識地形塑兼具物質與精神的莊園，加速了莊園審美化的進程，體現了文化涵養與審美觀念，將莊園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徵引書目

一、古籍（按作者時代排序）

1.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9月4版）
2. 晉·陸翽：《鄴中記》，收於《龍溪精舍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
3. 北魏·楊銜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月1刷）
4.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月5版）
5. 南宋·馬光祖、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1版1刷）
·《世說新語》呈現的魏晉園林文化·
· 89 ·
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月5版）
7.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6年1月2版）
8. 南朝梁·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5月5版）
9.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0. 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三（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二、近人著作（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1. 丁俊清：《中國居住文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1版2刷）
2. 王曉毅：《放達不羈的士族》（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7月台灣初版）
3.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1刷）
4. 沈福煦：《中國古代建築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5.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3月）
6.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臺北：洪範書局，1984年2月3版）
7. 馬良懷：〈漢晉之際莊園經濟的發展與士大夫生存狀態之關係〉（《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
8. 張承宗：《六朝民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9月）
9.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8月）
10. 張家驥：《園治全釋——世界最古造園學名著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1刷）
11. 張萬起、劉尚慈：《世說新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8月1刷）
12.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初版12刷）

13. 劉強輯校：《世說新語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
14. 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全評新註世說新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3月1刷）
15. 蕭默：《中國建築史》（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1·東海中文學報·
·90·
刷）
16. 鍾敬文主編；郭必恒等著：《中國民俗史》（漢魏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_

Garden Culture in the Wei-jin Period: As Witnessed by *Shishuo Xinyu*

Wang, Miao-shun*

【 Abstract 】

The Wei-jin Period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s when royal, temple and private gardens were equally predominant. At the time, the scholar-gentleman class reached its peak in social domination and cultural excellence, possessing a unique place in politics, economy, thoughts, and arts. The rise of the manor laid a good econom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cholar-gentlemen; it also enhanced their interest in building gardens in private estates with their unique sense of aesthetics and rich cultural literacy. This heralded the beginning of the literati gardens, and, ever since then, private gardens rivaled with royal gardens. During the time,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prevailing of Taoism yet made possible the emergence of a third kind, the temple gardens. As a result, the triparti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rden set forth. In *Shishuo Xinyu*, one can see royal, temple and private gardens stand out equally.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heritage and variations of the Wei-jin garde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cholar-gentlemen's aesthetic sense of gardens,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ing their inner world evinced in their garden-residence.

Key words: *Shishuo Xinyu* scholar-gentleman class in the Wei-jin Period garden culture royal garden private garden temple garden

*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